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四 編

林慶彰主編

第19冊

從「華夷」到「中西」：
清代《春秋》學華夷觀研究（下）

蕭敏如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華夷」到「中西」：清代《春秋》學華夷觀研究（下）／
蕭敏如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9〔民98〕

目 6+190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四編：第19冊）

ISBN：978-986-6449-18-5（精裝）

1. 春秋（經書） 2. 民族意識 3. 研究考訂 4. 清代

621.7

98001920

ISBN - 978-986-6449-18-5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四 編 第十九冊

ISBN：978-986-6449-18-5

從「華夷」到「中西」：清代《春秋》學華夷觀研究（下）

作 者 蕭敏如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年3月

定 價 四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從「華夷」到「中西」：
清代《春秋》學華夷觀研究（下）

蕭敏如 著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導 論	1
第一節 從「華夷」到「中西」——問題意識的形成	2
一、「華夷」與「民族」之間：文化的或不只是文化的——概念的探討	2
二、「華夷」：從「滿漢」到「中西」——問題意識的形成	7
三、在走向現代的前夕：1644~1861——研究的時代斷限	14
四、從《春秋》學開始——研究文本的設定	17
第二節 學界研究成果的回顧與評述	17
第二章 清初遺民士人的《春秋》學華夷觀	23
第一節 王夫之《春秋》學中的夷夏觀	25
一、地域上的夷夏之辨	27
二、血緣與「種族」上的夷夏之判	37
三、文化上之夷夏：王夫之的國族認同與夷夏觀	40
第二節 顧炎武政治認同的轉變及其《春秋》學中的華夷論述	45

一、顧炎武政治認同的轉變	47
(一) 清入關初期	47
(二) 「小節亦奚取」：顧炎武政治心態的轉變	50
(三) 晚年政治認同之轉變	56
二、民族意識與政治認同：顧炎武《春秋》學中的華夷論述	60
(一) 尊王	61
(二) 正朔：顧炎武《春秋》學之正朔論及其現實上的政治認同意涵	62
(三) 夷狄	64
第三節 清初遺民春秋學詮釋重心的轉移：「尊王」論述的沒落與極端「攘夷」論的興起	69
一、「尊王」論述的沒落：解構君主權威性	71
二、「攘夷」與排滿：清初遺民士人的民族意識	72
第三章 清初民族政策與官方《春秋》學中的華夷觀（1644～1735）	77
第一節 清初文教與民族政策中的官方「教化」觀點	81
一、「興文教」：清初治漢政策與滿洲漢化	81
二、官方漢文經學典籍編譯出版政策中的「教化」意味	87
第二節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與康熙朝官方《春秋》學華夷觀	92
一、康熙朝之官方《春秋》學與《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93
二、《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之詮釋觀點	95
(一) 筆削褒貶之說，流於穿鑿，「恐不是聖人之意」	98
(二) 「《春秋》本無例」，遷就義例以解經，則「其失拘而淺」	99
(三) 「黜吳楚」之因，在於「僭王」	103
第三節 雍正朝官方《春秋》學中的夷夏論述	105

一、何爲「《春秋》大義」？——曾靜案後雍正學術政策之轉向及《大義覺迷錄》中的夷夏觀	110
二、《日講春秋解義》與雍正時期官方《春秋》學之華夷詮釋	126
(一) 言「尊王」而略「攘夷」：《春秋》大義在「君臣」而非「華夷」	128
(二) 華夷關係：華夷之別在文化、倫理而非血緣地域	131
(三) 書人書爵、筆削義例，義常不通	133
第四節 小 結	137
一、令士子輩知所趨向——康雍時期官方經學的教化傾向	138
二、《春秋》大旨在「君臣」而非「攘夷」	139
三、「華／夷」爲文化論述而非種族論述	141
四、《春秋》「據實書事」，筆削義例之說多「錯解經義」	147
第四章 「天朝」秩序下的「華」與「夷」：從乾隆《御纂春秋直解》中的華夷論述看滿洲官方「華夷」認同之轉變	151
第一節 「尊王」意識與乾隆時期的文教政策	152
一、文字獄	153
二、禁 書	162
三、官方漢文經學典籍編譯出版政策	166
第二節 附著於「尊王」思想下的華夷論述：《御纂春秋直解》與乾嘉官方《春秋》學中的華夷觀	169
一、「《春秋》爲尊王而作」：清代官方《春秋》學「尊王」詮釋傳統的發展	174
二、《御纂春秋直解》中的華／夷論述	183
第三節 乾隆時期官方《春秋》學華夷觀的另一面相：四庫全書本《胡氏春秋傳》對宋刊本《春秋胡氏傳》的刪修	191
一、詞彙上的置換與更易	192
二、對胡安國《春秋胡氏傳》華夷論述觀點	

的修正	194
(一) 對胡《傳》華夷論之刪削	195
(二) 對胡《傳》華夷論述之改寫	197
第四節 「天朝」思想下的「華」與「夷」：乾隆時期官方華夷認同的轉變	202
一、「《春秋》之道」：清初日、朝《春秋》學華夷論爭對乾隆時期官方《春秋》學「華夷」觀之影響	203
二、從觀禮之爭看乾隆朝官方華夷觀的轉變	210
第五節 小 結	215
下 冊	
第五章 乾嘉士人《春秋》學中的華夷論述	219
第一節 乾嘉士人《春秋》學	223
一、回歸三傳：對官方春秋學「舍傳求經」的批判	225
二、漢宋之爭下的乾嘉《春秋》學	227
三、以經議政：常州春秋公羊學的崛起	230
第二節 乾嘉士人《春秋》學華夷論述與民族認同的轉變	233
一、由「攘夷」到「尊王」——清代士人《春秋》學核心論述的轉變	233
二、「大一統」：天朝意識下的《春秋》學華夷論述	237
(一) 莊存與	238
(二) 劉逢祿	242
三、「內外」異例與「中國亦新夷狄」論述	244
(一) 莊存與	245
(二) 劉逢祿	250
第三節 小 結	252
第六章 從「用夏變夷」到「師夷長技」——道咸士人《春秋》學華夷觀的變化	255
第一節 鴉片戰爭後的中西情勢與文化視野的變化	256

一、懷柔遠人？：鴉片戰爭前夕的中西文化衝突	256
二、天朝崩潰：鴉片戰後清廷與士人華夷觀之轉變	263
(一) 復辟的「攘夷」論述：強化華夏中心論	264
(二) 「師夷長技」與「西學中源」：華夷心態的變化	268
第二節 從「用夏變夷」到「師夷長技」：道咸兩朝的《春秋》學夷夏論述	272
一、龔自珍	273
二、魏 源	278
三、張應昌	281
第三節 小 結	284
一、核心問題的再次轉化：從「尊王」回歸「攘夷」	284
二、「華／夷」主體的轉變：從「滿漢」到「中西」	285
三、「華／夷」文化價值觀的轉變：從「用夏變夷」到「師夷長技」	286
第七章 結 論	289
一、從「滿漢」、「中外」到「中西」：《春秋》學「華／夷」論述主體的轉變	290
二、文化的抑或種族的：清代《春秋》學華／夷詮釋性質的轉變	292
三、「中華」：想像共同體的形成	294
四、「尊王」與「攘夷」之間：清代《春秋》學問題意識的轉化	295
五、文化價值觀的轉化：從「用夏變夷」到「西學中源」、「師夷長技」	296
參考書目	299
附 錄	321

第五章 乾嘉士人《春秋》學中的華夷論述

從順、康、雍至乾隆時期，滿洲官方的自身的華夷態度甚至華夷認同顯然已有極大變化。但，從漢人士民的角度而言，從順治以至乾隆，漢人對滿洲、對清廷的華夷心態，同樣也有所轉變。清入關初期，漢人面對滿洲強大的軍事與政治威脅，對陌生的「滿洲」充滿「異己」的文化想像。清初的明遺民天都山臣在其《女直考》中，就鮮明地摹寫出當時漢人對滿洲的異化想像與印象：

女直……阻山穴居，塗豕膏禦寒，無君長，射用楛矢，石鏃長尺八寸……其俗常以秋月造毒藥傅矢，射禽獸立死，畜多豕，衣其皮，以溺濯，於諸夷中最穢。〔註1〕

在滿洲入關之初，漢人這種對滿洲人的文化印象，固然出於面臨滿洲軍事威脅下的負面想象，但從這種對滿洲的異化想像之中，還是可以看出清初遺民士人「嚴守華夷分際」的民族心態。

不過，所有對異民族的文化想像，都是在缺乏對話的情況下產生。乾嘉時期的中國，歷經順治、康熙及雍正三朝近百年（1644～1735）的滿洲統治之後，清政權已日趨穩定。在此一時期，滿漢之間依舊存在著階級差異，而這種差異不僅反映在「旗籍」與一般漢人上，在仕宦上也存在著不成文的滿漢地位偏見。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來華使臣馬戛爾尼在其出使中國的日記裡便曾記述：「入夜，一韃靼大員，統領此間兵隊者，至行宮中拜見。……

〔註1〕《女直考》（《四部禁燬書叢刊》據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景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史部第三十六冊），頁420。

此人舉止動作頗彬彬有禮，有君子人氣概且極有見解……然此人殊傲慢自大。樊大人（漢人官員）雖亦戴一頂紅頂子，且武職與此人相若，然當此人之前，樊大人惶恐不敢就坐。」〔註2〕漢人官員在面對與自己同一官銜、同一職等滿人官員時，仍然會對滿人官員表現敬意。

從馬戛爾尼的記述來看，乾嘉時期滿漢之間的確仍存在著差異。但，這樣的差異，與其說是文化上的差異，不如說已經漸漸轉為社會地位上的差異。甚至，在官方文書的撰寫上，也由原本的強制兼書滿漢文，開始漸漸通融在某些純粹漢臣的場合下，不必再依循順治以來國書必須「兼寫清漢」、滿漢兼行的規定，而可以單書漢文。《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百八十八，〈禮部·卹典〉條：

（乾隆）四十九年，諭：翰林院撰擬祭文，向俱兼寫清漢，如壇廟群祀，載在禮官祀典者，自應需用國書。若滿洲大臣，亦當用清文諭祭。至漢大臣，本不諳清語，諭祭時原可專用漢文，又何必重加繙譯，致滋煩瑣？嗣後翰林院撰漢大臣祭文，俱著不必兼繙清字。

〔註3〕

乾嘉時期，滿漢之間的差異雖然依舊存在，但其性質似乎已逐漸有所轉變。由清初的文化與社會地位差異，逐漸淡化為僅是社會地位上的差距。

這種華夷認同與滿漢心態上的變化，其原因必須追溯至順治以來清廷為了統治漢人而實施的「興文教」與「滿漢一體」政策。順、康以降，滿洲政府為了籠絡漢人而再三申諭的「滿漢一體」政策呼籲，並在乾嘉時期開放宗室參與科舉，〔註4〕導致滿人的民族文化特徵迅速失落。入關之後，滿人普遍且急遽地漢化，使嘉慶慨嘆「近日旗人耳濡目漸，已不免稍染漢人習氣」。〔註5〕滿人漢化情形之嚴重，迫使乾隆、嘉慶兩朝都分別多次申諭嚴禁旗人沾染漢習、改漢姓，〔註6〕並不得不公開申諭滿洲年輕子弟勿忘「清語騎射」。嘉慶五年（1800）

〔註2〕馬戛爾尼著，劉半農譯《一七九三乾隆英使觀見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頁82。

〔註3〕托津：《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六十七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卷三百八十八，頁7631～7632。

〔註4〕《仁宗實錄》，嘉慶五年十月十三日壬戌條。

〔註5〕《仁宗實錄》，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甲寅條。

〔註6〕《高宗實錄》，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辛亥條，下旨訓諭八旗及各省駐防旗人不得沾染漢習，亦不可忘滿洲姓氏，並嚴命「嗣後滿洲命名，斷不可數代俱用一字起頭」。乾嘉時期，官方有意識的去維繫、「建構」這種滿洲文化

正黃旗滿洲世襲恩騎尉常安，便因不諳國語（滿語），問不能答，而被下旨申飭：「清語騎射為滿洲根本，年輕之人，理應專心學習，以期不廢本業」。^{〔註7〕}

除此之外，乾嘉時期滿漢聯姻的現象也十分普遍，甚至連滿洲宗室、覺羅都有與漢人聯姻的情形，致使嘉慶十八年（1813）不得不注意到這個現象，並對宗室覺羅（而非所有滿人）滿漢聯姻的現象加以申飭，唯對於已存在之聯姻關係「各予應得處分，不必離異」，只「自此日始，申明定制，嚴行飭禁」。^{〔註8〕}雖然官方仍以「旗籍」來識別滿人、漢軍與漢人，但在實際的社會氛圍上，滿漢之間不僅文化差異迅速消失，而原本藉以區隔滿漢的主要依據——姓氏與血緣，在滿漢聯姻與滿人「改漢姓」現象，也導致滿漢界域與華夷認同的錯亂。

清初康、雍兩朝不斷對漢人呼籲「滿漢一體」、統治者積極學習漢文漢語、刻意「興文教」、掌握祭孔、科舉等漢人文化活動的政策，^{〔註9〕}加上滿人入關後迅速漢化，致使滿漢之間的「異己」氛圍正漸漸失落。因此，乾嘉時期，滿漢之間的文化差異正日漸消失，人民對社會上滿、漢雜處的民族結構也漸漸習以為常。曾幾何時，對漢人來說，清初遺民這種對女真「秋月造毒藥傳矢，射禽獸立死，畜多豕，衣其皮，以溺濯，於諸夷中最穢」的異民族想像，已隨著滿洲政權的穩定乾嘉盛世的來臨而漸漸消逝。

滿人漢化與滿漢之間的頻繁交流，導致漢人對滿人「異己」氛圍的轉變。

習慣。順治朝並無強調「清語騎射」的政策，但自康、雍以降，清政府都極力勸諭滿人勿忘「國語騎射」。特別是在乾、嘉兩朝，這樣的政策呼籲時時出現。主要原因即在於清入關初期，滿洲人多保持原有的關外生活文化習慣，無需特意強調。從乾隆、嘉慶兩朝對「國語騎射」的呼籲，可以看出當時關內外滿人在滿洲語言與文化上的失落，已十分嚴重。

〔註7〕《仁宗實錄》，嘉慶五年四月十六日戊戌條。

〔註8〕《仁宗實錄》，嘉慶十八年六月初九甲辰條。本日宗人府移居宗室戶口名單內，開寫妻室氏族，內有張氏、李氏、白氏、陳氏，是否漢軍抑係漢人？著宗人府查明具奏。

〔註9〕順治三年（1646）與順治六年（1649）的科舉中，殿試策論分別以「使滿漢官民同心合志」（《世祖實錄》順治三年三月壬戌條：「欲定天下之大業，必一天下之人心，吏謹而民樸，滿洲之治也。今如何為政，而後能使滿漢官民同心合志歟？」）、「聯滿漢為一體」（《世祖實錄》，卷31，頁14，順治四年四月十二日庚子條：「從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朕自入中原以來，滿、漢曾無異視，而遠邇百姓猶未同風。豈滿人尚質，漢人尚文，習俗或不同歟？音語未通，意見偶殊，抑或未化歟？今欲聯滿漢為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歡然無間，何道而可？」）為題，營造出「滿漢一體」、多民族並治的氛圍。

「華夷之辨」，正是建立在「自我」對「異己」的想像、解讀與判釋之上。乾嘉時期社會民族氛圍的轉變，相對也影響了滿洲官方華夷身分認同的變化，並影響了漢人對滿洲的接受心態，進而影響士人的華夷觀。清初官方與遺民雙方不斷強調的「華夷之辨」，核心議題就在於彼此透過對「華／夷」定義的探討，宣示自己的民族立場，並界定自身文化與政權的合法性。華夷究竟是文化論述或是民族論述？「華／夷」的界限究竟是在「文化」還是「血緣、地域」？這個議題，在清初官方與遺民《春秋》學間引起廣泛討論，而《春秋》學詮釋也成為滿漢分別申說「民族」議題的學術場域。

乾嘉時期，社會上華夷氛圍的轉變，也波及到《春秋》學上。原本清初《春秋》學遺民士人與官方各自偏重於「攘夷」、「尊王」的詮釋風氣，也隨著乾隆時期社會氛圍的變化而產生劇烈的轉變。從社會上的民族氛圍來看，滿漢之間的階級差異雖然依舊存在，但「異己」氛圍已漸漸消失——滿漢人民接觸頻繁，關內滿人改漢姓、說漢語的漢化情況日益普及，關外滿人也開始追求文事而漸廢武術。官方長期在政策上強調「滿漢一體」、在學術上又以文化來作為《春秋》「華夷之大別」的判準，都對漢人士民的華夷觀形成一定程度的影響。社會上漢人對滿洲「夷狄」、「蠻夷」的印象與異己氛圍的轉變，使得清初《春秋》學以探討「滿／漢之別」為主要對象的《春秋》「華／夷之辨」議題逐漸失去了原有的著力點。乾嘉時期社會民族衝突的淡化，將如何影響漢人士人《春秋》學中的「華夷」詮釋？除此之外，乾隆朝官方《春秋》學華夷論的基本方向，例如以「辨內外」取代「辨華夷」等，對這一時期乾嘉士人《春秋》學有何影響？這是本章所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另一方面，在乾嘉時期皇權絕對性的政治與社會氛圍下，自清初以來對「《春秋》大義」的探討，在乾嘉時期不同的時代氛圍裡，是否依舊會為這一時期的《春秋》學所繼承？又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這是本章所要探討的第二個問題。

乾嘉時期，也是中國在外交上與西歐開啓對話的重要時期。清政權從乾隆朝開始，刻意建構「天朝」形象，並以「中華」自居，企圖建立起清國在東亞甚至世界的政治與文化上的「共主」地位。其後，嘉慶朝在外交方面，基本上繼承了乾隆朝的「天朝體制」，在對外關係上極力維護「天朝」的地位。乾嘉兩朝建構出「天朝」形象，除了影響滿洲統治者本身的「中華」認同之外，也影響著民間滿漢士民對「中華」概念的認同與「華夷」定義的轉變。在「天朝」體系的思維下，也使得「大一統」的思維在這個時代達到極致。

這一切是否影響乾嘉時期的經學詮釋（特別是與「大一統」、「華夷」、「尊王」概念密切相關的《春秋》學詮釋），又是如何影響乾嘉時期的經學詮釋？這是本章所要探討的第三個問題。

第一節 乾嘉士人《春秋》學

對清代士人學術而言，乾隆朝是清官方對政治言論控管最為嚴密的時期。雖然乾隆二十年（1755）時，乾隆曾自稱「朕御極以來，從未嘗以語言文字罪人」，〔註10〕但事實上終乾隆一朝，共有百餘起文獄。文網之密，堪稱亙古未有。而官方控管士人著作的標準，可以從乾隆二十年（1755）時胡中藻《堅磨生詩鈔》與鄂昌詩文酬唱案的上諭看出：

汝親往鄂昌撫署中，將其與胡中藻往來應酬之詩文、書信嚴行搜查，并其與別人往來字迹中有涉譏刺、囑托者，亦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馳驛送來。……汝查伊字迹中若實有誹謗可惡情節，則汝一面奏聞，一面前往安西傳旨，令彼離任，查其隨身所帶字迹，撫務汝亦暫為兼管候旨，不可稍涉瞻徇，不可預漏風聲。〔註11〕

凡在應酬詩文、書信中「連篇累牘，無非謗訕詆毀之語。不惟謗及朕躬，且敢詆毀國家」，〔註12〕涉及「譏刺」、「囑托」、「誹謗」等與政治相關的文字，都成為言論檢查的對象。

除了因政治而起的文獄之外，也有因經學意見與官方相違而形成的文字獄。特別是在乾隆執政的前十年，出現數起因經學詮釋與官方意見相違「妄論經義」、或藉講經評議政事而被乾隆申斥、懲處的事件，如：乾隆元年（1736）發生的謝濟世詆毀程朱案〔註13〕及李徽以《孝經》與《四書》並列案〔註14〕兩個事件，乾隆六年（1741）又發生全淵《四書宗注錄》案〔註15〕及謝濟世

〔註10〕《清代文字獄檔》（上海：上海書店，2007年6月），頁58，〈核定胡中藻等罪名旨〉。

〔註11〕《清代文字獄檔》，頁35，〈劉統勛奏赴蘭查辦鄂昌詩文書信折〉。

〔註12〕《清代文字獄檔》，頁58，〈核定胡中藻等罪名旨〉。

〔註13〕乾隆元年二月，謝濟世請用自注《學庸》以易朱子章句，頒行天下，帝以謝濟世肆口詆毀，狂悖已極。事見《高宗實錄》，乾隆元年二月十六日庚辰條。

〔註14〕乾隆元年二月，李徽欲以《孝經》與《四書》並列為五，帝以其妄行瀆奏，後從寬免究。事見《高宗實錄》，乾隆元年二月十六日庚辰條。

〔註15〕乾隆六年八月，湖廣總督那蘇圖奏，通山縣民全崇相刊刻其父、已故舉人全

私刊自著學庸注疏案，〔註 16〕乾隆八年（1743）周長發又以藉講經史以議時事而為乾隆所申飭，〔註 17〕乾隆九年（1744）又有黃明懿借講經之名以諷時事案〔註 18〕等。由此可知，乾隆十年之前，曾對學術界「妄論經義」、毀謗程朱的情形加以管制，並藉由這些事件以宣誓官方申飭士人「借經史以牽引時事」〔註 19〕的立場。但，在乾隆藉刊行御纂經注以統一官方經學詮釋觀點之後，官方對士人經注的干預與「妄論經義」的懲治明顯減少。相較於乾隆十年以後官方經學態度的鬆綁，乾隆中後期詩文控管則漸趨嚴格，〔註 20〕經學成為相對開放的言論場域。

另一方面，清初以來，《春秋》學的詮釋即被渲染上強烈的政治色彩。從士人《春秋》學的角度而言，「華夷之大別」與《春秋》學中的「攘夷」觀點，成為清初遺民士人藉以宣傳攘夷、排滿思想的儒學經典論據。顧炎武、王夫之、呂留良、曾靜等以遺民自居的士人們，紛紛透過對《春秋》「夷夏」之詮釋，渲染漢人的反滿情緒，並鼓動漢人的民族意識。他們以「華夷之大別」將滿洲他者化，強調漢人與滿洲之間的「異己」。

淵《四書宗注錄》一書，中有推崇逆犯呂留良之處。帝朱批：「自應追出書板銷毀，至全崇相愚昧無知，照例處置可也。」事見《高宗實錄》。

〔註 16〕乾隆六年九月，帝以謝濟世私自刊行所著學庸注疏，諭軍機大臣等：朕聞謝濟世將伊所注經書刊刻傳播，多係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從來讀書學道之人貴乎躬行實踐，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辨別異同，況古人著述既多，豈無一二可以指摘之處，以後人而議論前人，無論所見未必即當，即云當矣，試問於己之身心有何益哉？況我聖祖將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為準繩，而謝濟世輩倡為異說，互相標榜，恐無知之人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風之義，且足為人心、學術之害。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關係，亦不可置之不問也。爾等可傳諭與湖廣總督孫嘉淦，伊到任後，將謝濟世所注經書中有顯與程、朱違悖牴牾或標榜他人之處，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銷毀，毋得留存。事見《高宗實錄》，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丁亥條。

〔註 17〕《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八四，乾隆八年二月初四戊子，頁 324，帝以翰林周長發藉經筵以講論時事，下諭申飭：「朕令翰林科道輪進經史講解，原以闡發經義、考訂史學也。而年來諸臣所進，往往借經史以牽引時事……」。

〔註 18〕《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二二四，乾隆九年九月乙亥條，頁 885～889，翰林院編修黃明懿於進講時諷諭本年北闈科場搜檢過嚴，帝以此亟論士風墮落士習日頹，並下諭嚴懲黃明懿：「若臣工有欲行陳奏之事，自應明白直陳于君上之前，何得借講之名，以巧用其術！……今乃借進講經書，隱諷時事，甚屬奸險詐偽者，著交部嚴察議處。」又見《清史稿》，卷十，〈高宗本紀一〉，頁 380：「以翰林院編修黃體明進呈講章，牽及搜檢太嚴，隱含諷刺，下部嚴議褫職。」

〔註 19〕《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八四，乾隆八年二月初四戊子，頁 324。

〔註 20〕見本文第四章，附表一：乾隆朝文字獄表。

從清初以至於乾嘉時期，清代的《春秋》學始終存在著難以切割的政治意圖，這使得清初的《春秋》學成為滿洲官方與漢人士民攻防民族思想、政權合法性的學術場域。凡此種種，都顯示清初以來的《春秋》學詮釋傳統，多少帶著點以經義隱喻政事的意味，在看似單純的經義探討背後，蘊涵著對當時社會上滿漢衝突問題與民族意識的探討。這種《春秋》學詮釋傳統，也為部分乾嘉士人的《春秋》學所繼承。雖然乾嘉之間，考據學風的興起導致士人治經興趣的轉向，但乾隆朝中後期官方對經學的管制放寬後，乾嘉中後期的《春秋》學也漸漸走向藉解經以論政事的詮釋方向。

一、回歸三傳：對官方春秋學「舍傳求經」的批判

在面對傳統《春秋》傳注的態度上，清代官方的《春秋》學始終有著擺落四傳的詮釋傳統，認為自明代以來「四傳並行，宗其說者率多穿鑿附會，去經義逾遠」。^{〔註 21〕}特別是胡安國《春秋胡氏傳》，自康熙以來清代諸朝官方《春秋》學更是多所批判。因此，清代官方的《春秋》學著作，無論是康熙朝的《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雍正間張廷玉等人重新校修之《日講春秋解義》，以及乾隆朝傅恆奉敕撰的《御纂春秋直解》等，在詮釋《春秋》時，都傾向於不專守一「傳」、雜糅諸說，而「舍傳求經」、直指經旨（此即《御纂春秋直解》以「直解」為名之意）的詮釋路向。^{〔註 22〕}

儘管清代官方《春秋》學極力宣傳四傳「穿鑿附會，去經義逾遠」的觀點，但官方這種拋卻傳注的呼籲顯然對士人《春秋》學影響不大，乾嘉學者多半反對這種「舍傳求經、不設條例，《經》則因史存義，不設褒貶」^{〔註 23〕}的詮釋路向。活躍於乾隆末至道光初的陳壽祺（1771～1834）在〈答高雨農舍人書〉中，即認為三傳或許有與《春秋》經文本身相違之處，但《春秋》本身並非全據魯史舊文直書，而是在魯史之上加以修改，以立筆削褒貶之意：

大夫奔書字，惟見文十四年宋子哀，蓋褒其不失職……皆《春秋》特筆也，是知聖人修改之跡，不可勝數。善善惡惡，義踰褒貶，然後是非由此明，功罪由此定，勸由此生，治亂由此正。故曰：《春秋》，

〔註 21〕 見《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百七十三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聖祖仁皇帝御製春秋傳說彙纂序〉，頁 1。

〔註 22〕 見本文第三章。

〔註 23〕 陳壽祺《左海文集》，〈答高雨農舍人書〉，收於《皇清經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卷一千二百五十四，頁 13762。

天子之事也。苟徒因仍舊史，不立褒貶，則諸侯之策，當時未始亡也，孔子何爲作《春秋》？且使孔子直寫魯史之文，則孟子何以謂之「作」？則「知我」、「罪我」安所徵？亂臣賊子安所懼？夫《春秋》之書，微而顯，志而晦，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況邱明、高赤之倫哉！《傳》雖言邱明造膝受《經》，然《經》成之後，下距夢奠之年，僅踰兩載耳。即不必有口授子貢、未著竹帛之疑，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精心，或未盡傳於弟子。洎九流分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儒者各論所聞，稍失其舊，此三傳之所以不能無與經相違之過也。〔註24〕

陳壽祺的觀點，和清康熙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所說的「孔子但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著」〔註25〕的觀點顯然不同。他認爲三傳不盡符合《經》意，「稍失其舊」，但《春秋》本身並非孔子僅依魯史據事直書，而是有意而「作」。同時，他也認爲三傳之解經有其價值，不可貿然捨傳求經：

《左氏》、《公》、《穀》，去聖人之世猶近，遺聞緒論，宜有所受。設無三傳，則《春秋》孤行數千載以至於今，雖聖哲復生，奚據以稽其文與事而斷其義？學者惡能道此經隻字哉？夫始恃三傳而得其本末綱統，終乃盡棄三傳，以爲經不待傳而詳，何異蟲生于苗，自食其根。而臆出無師之智，逆探數千載之前，而謂獲千載不傳之祕。吾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惡睹其愈于入室而操戈者哉！……故《春秋》廢三傳則無以明國史得失之端，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窮經之弊，不可不慎，防其流也。〔註26〕

陳壽祺指出「舍傳求經」之說，終將導致自爲是非、「臆出無師之智」。官方宣揚「擺落四傳」、直釋經旨的觀點，在重視「考證」、「實據」的乾嘉學者眼中，徒顯浮學無本。

在重視文獻資料的崇實風氣下，乾嘉學者肯定三傳對於探索《春秋》經

〔註24〕陳壽祺《左海文集》，〈答高雨農舍人書〉，卷一千二百五十四，頁13702。

〔註25〕《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首上，〈綱領二〉，頁25：「若謂添一個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春秋》所書，如某人爲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爲褒貶。孔子但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較，筆削異同然後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註26〕陳壽祺《左海文集》，〈答高雨農舍人書〉，頁13703。